

前沿文化论争备忘录

Z S F Z L C

策划/张明 主编/李世涛

知识分子立场

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

-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
——香港中文大学25周年纪念讲座第4讲
- 激进与保守：一段尚未完结的对话
- 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
- 近代思想史上的“主义与问题”之争的再思考
- 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
- “第三世界批评”在当今中国的处境
- 反激进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
- 何谓“大陆新保守主义”？
- 真假亨廷顿与东西亨廷顿
——从“新保守”到“文明冲突”的此岸回应



时代文艺出版社

策划 / 张明 主编 / 李世涛

知识分子

立场

激进与保守之

间的动荡

现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识分子立场/李世涛主编.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9

ISBN 7-5387-1383-2

I. 知… II. 李… III. 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5078 号

知识分子立场

选题策划: 张 明

主 编: 李世涛

责任编辑: 姜淑华

责任校对: 姜淑华

装帧设计: 李法明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美亿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1300 千字

印 张: 50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套

书 号: ISBN7-5387-1383-2/I·1343

定 价: 84.00 元(全三册)

编选说明

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几代中国人的理想。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反思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和命运,无疑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从80年代末迄今,中国知识界经历了关于保守主义、人文精神、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论争。其中涉及到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现代性和现代化发展模式,对中国现状(特别是思想文化现状)的基本评判,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以及知识分子立场等问题。事实上,海外学者也有类似的论争,国内的讨论是对他们论争的回应和深化。其展现出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并预示了:这些论争已经并将为中国思想界带来重大影响。关注这些论争对于我们理解现实变革和思想嬗变都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面临的危机也不容回避,这些危机困扰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从现实和文化的层面上对此进行清理,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是当代知识分子的重要职责。本书选辑的这些文章从一定程度上承担起了这些职责,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及其发展,也启发我们从多角度理解“中国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给中国现代化带来的影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些学说本身非常复杂,而且又彼此勾连,加上东西方实践中所产生的复杂结果,对此进行梳理便显得非常困难。但从其运作中总结经验教训,不但有助于我们认识它们的得失,而且有助于我们从中汲取营养,以此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资源,从而有助于思考和解决“中国问题”。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立足于自身,同时还要以国外的现代化建设为参照,并努力从历史中发掘有益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文章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和深刻的启示。

为了使大家更深入地把握这些论争,我们有意识地收集了一些重要的争鸣文章,尽可能地使大家能够理解和掌握他们各自的思路

和观点。内容包括:①这些论争的文章,及关注由论争引发的论题的文章;②关于文化思潮的有见地的文章,这些文章和论争的论题有共通性。本丛书选取了关于激进与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三次论争作为中心,分为:(一)《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二)《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三)《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我们本着客观的原则,力图通过这些文章反映论争的原貌,同时争取通过这些文章反映中国思想界对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这些论文涉及面较广,加上作者所从事的专业和视角的不同,自然会有观点的分歧和碰撞,惟有如此,才能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通过真诚而有理性的对话,从而接近真理。应该说,这些论文都是他们的“一家之言”,不代表编选者的观点,希望读者能对它们予以分析、鉴别以致于批评,这是我和作者共同期盼的,我们希望能记录下思想界的探索,同时也为以后的探索积累些材料。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应当为社会提供超越性价值意义的规范。他们不但应该是清醒的,批判性的,“枭鸣”的猫头鹰,而且还应当承担起守望的捍卫真理的使命,惟有如此,他们才能不辜负于“有机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尽管观点各异,但知识分子的立场是一致的,这也是我们书名的意义之所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我们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空前发展的时代,时代要求思想界进行充分的对话,从而为现实发展提供最大的可能,入选文章既体现深刻的学术思想性,又体现可读性;既有论文,也有访谈、评论。但愿我们能在这些文章中体验到世纪末中国思想界脉搏的跳动!

编选者

二〇〇〇年元月一日

目 录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

- 香港中文大学 25 周年纪念讲座第四讲……余英时 (1)
- 激进与保守:一段尚未完结的对话 …… 姜义华 陈 炎 (30)
- 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许纪霖 (37)
- 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张 灏 (42)
- 20 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政治保守主义 …… 姜义华 (57)
- 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 …… 李泽厚 王德胜 (74)
- 中国近代史几个问题评价的再评价……………李锦全 (84)
- 谁应对辛亥革命负责?

- 与李泽厚先生商榷……………陈小雅 (93)
- 甲午战败与中国精英阶层的激进与困厄 …… 马 勇 (103)
- 戊戌变法的再反省

- 兼论早期政治激进主义的文化根源 …… 萧功秦 (121)
- 近代思想史上“问题与主义”争论的再思考 …… 萧功秦 (142)
- 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新诗创作……………郑 敏 (158)
- 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

- 与郑敏先生商榷……………范钦林 (187)
- 关于《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商榷之商榷……………
- ……………郑 敏 (198)

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维度

- 从郑敏、范钦林的争论说开去……………许 明 (207)
- 跨世纪之交:文学的困惑与选择……………沉 风 志 忠 (219)
- 五四·文革·传统文化……………严家炎 (231)
- 北大学统与“五四”传统

- 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刘 东 (241)
- 新文化运动与“激进主义”……………袁伟时 (252)

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	王元化 李 辉 (271)
文化崩溃时代的逃亡与皈依	
——90年代文化的新保守主义精神	孟繁华 (287)
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	陈 来 (293)
反激进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	陈晓明 (309)
时间神话的终结	唐晓渡 (321)
民族自尊的误区与现代文化的选择	
——对一种东方怀古情结的批判	范钦林 (336)
后学,新保守主义与文化批判	赵毅衡 (343)
如何面对当今中国文化现状	
——海内外大陆学者的一场辩论	赵毅衡 (357)
“第三世界”批评在当代中国的处境	徐 贲 (368)
何以“保守主义”,而又“新”?	金元浦 (385)
何谓“大陆新保守主义”?	郑 敏 (391)
今日中国的新保守主义	王思睿 (406)
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激进与保守之维	王岳川 (422)
告别黑格尔	
——从张中晓、李泽厚、王元化到顾准	单世联 (439)
保守自由主义:中国文化建构的第三种选择	陶东风 (475)
新保守主义与新理性主义	
——90年代人文思潮批判	杨春时 (486)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和平革命与新理性主义	姜义华 (493)
低调一些	
——向文化保守主义进言	陈少明 (507)
“只有一次,等于没有”	
——关于“保守”与“激进”的经验之争	苏 文 (514)
真假亨廷顿与东西亨廷顿	
——从“新保守”到“文明冲突”的此岸回应 ...	卞 悟 (526)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

——香港中文大学 25 周年纪念讲座
第四讲(1988 年 9 月)

余英时

今天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再来中文大学演讲。还记得 1974 年中文大学庆祝建校 10 周年时,也有一个 10 周年学术演讲,那时我讲的是“《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今天能再次主持这样隆重的演讲,又有机会再跟大家见面,我感到十分高兴。

今天的讲题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激进与保守”就是英文所谓的 radicalism versus conservatism。我想说明一点,我说思想史上的 conservatism 跟 radicalism,不是我们一般说的政治态度上的保守派、激进派、革命派。我主要是讲,在思想上某些有意识发展出来的看法,而不光是从现在的行为来讲。所以我不会涉及现在北京有谁是保守派、谁是激进派。当然现实上的激进派和保守派,跟思想上的 conservatism 和 radicalism 是有关系的。所以我想我的演讲应该限制在思想史上,也就是我尽量希望这是一个与现代生活有关联的,但却是一种独立的历史的研究、思想史的研究。

我的专业并不是近代的或现代的思想。不过研究古代思想的人,当然也不可能完全忽略近代和现代的思想;这些思想有些可以说是我一生经历过的。譬如说“五四”以后,自 40 年代起,中国思想界的变化,是我个人历史的一部分,至少是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所见的中国思想界的变化。所以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进行一点儿反省、反思(reflections)。

我所说的激进、保守并不是说哪一套思想,也不是指某一特定

的学派。我们讲保守,并不是指儒家;我们讲激进,也不是讲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所谓左派的、激进的思想。我指的是一种态度,英文叫 disposition,一种倾向,或者是一种 orientation。这种态度是常常发生的,特别在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有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两种态度我们常常看得见。

保守主义,conservatism 这个字,大概是很近的东西。西方人讲保守,或者讲政治思想上保守主义的大师,创始人是英国的 Edmund Burke,他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观察了法国大革命的各种毛病,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这本书在政治思想史上获得很高的评价。现在讲西方保守主义的人,没有不从这本书开始,例如 Russel Kirk 的名著 *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Eliot* (Rev. Ed. 1986), Robert A. Nisbet, *Conservatism: Dream and Reality* (1986 年)。但是并不是 Burke 被动地对法国大革命作一些反应,因为其中一些观念是他早在法国革命以前就已经有了。

另一方面,conservatism 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学说、思想,虽然出现得比较迟,可以说是法国大革命以后慢慢发展起来的;可是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态度,在中国史上也早就出现过,虽然我们不用这个名词。我们记得中国宋朝时王安石要变法,当时也有守旧的人如司马光,他从史学观点加以批评、反对。我们可称司马光为中国保守主义的思想家,因为他的保守并不是没有意识的,也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说不要变动。而王安石更是很有意识地发展出一套很激烈的态度。不过严格地说,这两个人都是在儒家、儒学的范围之内。譬如王安石变法也要写《三经新义》,这显然是要跟儒学某些部分认同。王安石说,为了变法“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这就是很激烈的一种 radicalism,但这是一种态度,没有实际的内容。要知道 radicalism 的实际内容,必须分析他变法的根据,以及变法的一套学理,才知道他实际的思想是什么。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说某某人保守,某某人激进,都是要有一

个定点。如果没有一个标准、没有一个座标,我们很难说某人是保守的、某人是激进的。因为保守跟激进一定是相对于什么东西来说。相对于什么呢?一般说是相对于现状,最简单地讲,保守就是要维持现状,不要变;激进就是对现状不满意,要打破现状。要打破现状的人,我们常把他放在激进的一方面,要维持现状的人,我们把他放在保守的一方面。可是,我们知道这样用的时候,保守和激进都可以有不同程度的态度:可以是极端的保守,什么都不变;也可以是极端的激进,一切都打倒。这是“两极化”,“两极化”的结果会是如此的。不过,这个用法我们还要了解一点,就是必须有一个现状,有某一种秩序: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秩序存在。对这个存在的秩序,有些人觉得不合理,要改变它;有些人觉得这个秩序基本上合理,要保持它。譬如刚才提及的 Buke,他就认为当时英国的宪法中的制度是基本上合理的。他反对像法国大革命那种激烈的破坏,但也并不是说就完全不要改变,他书中讲要变的地方也很多,所以说,保守主义不是说一个人什么都保守;而指一个人是激进主义,也不是说他必然激烈到要摧毁一切。在保守和激进之间,有各种程度不同的立场。

但是,无论如何,这两个态度是相对于某一种现状、某一种现存的秩序来说的。所以我们要讲历史上的保守跟激进,必须要了解一种现状。从这方面看,中国近代思想上的所谓保守与激进,跟西方的甚至跟中国过去的都不同。为什么会不同呢?我们可以这样说,譬如在美国讲保守主义,通常是用于一个政治意义的,就是说政治上的保守。Conservatism 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的概念。不过,我在这里却要把文化的也放在里面。

在美国讲保守主义,是相对于一种现有的制度,就是美国民主、自由的制度,美国的法制。简单说就是美国的一整套系统(system)。这个系统我们知道在西方两三百年来叫做民主、自由主义的传统秩序。从经济上看,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民主自由跟资本主义、资本家、中产阶级在起源上、发生上有很重要的历史

关联,可是却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资本主义。这个秩序从美国有宪法以来,已经维持了两百多年了。他们所谓保守,就是说对于现有的状况,这一套自由民主制度下的现状、法律比较满意,不需要大改变。譬如说美国这几年,特别是过去8年,正是处在一个保守主义心态占优势的情况之下。大家不大喜欢动乱,跟60年代末期反越战和70年代初期激烈主义在美国占优势的情况完全不同。这个时候,至少是多数的中产阶级,包括一般的小商人,都希望不要大变,希望经济上有一些秩序,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赚钱养家,可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希望保守的,所以共和党才能当政。到今天还是有这种保守主义的倾向,所以布什就拼命地把其对手杜卡基斯打扮成一种 liberal,因为 liberal 是比较激进的。事实上 liberalism 是美国的一个主题。美国的 radicalism 跟 conservatism 是相对于这个自由传统来说的。可是,这个自由传统,或 liberal 这个字本身也很麻烦,我们就常说某一个人是保守的自由主义者,某一个人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如果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就是指他对人权、黑人的问题,还有其他种族的问题、堕胎的问题、污染的问题等,都有新的看法,都是向前推动的,保守的人就是喜欢少动,但不是主张不动。

现在美国还处于一种保守思想占优势的情况之下,所以布什的政策就是要把对方打扮成一个激进派。但是,激进与保守本来是相对于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的 system,所以如果要讲美国保守主义跟激进主义,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它中间是一个 liberal。这样 conservative——liberal——radical 便成为一个鼎的三足。这不是两极,两极就是一边保守,一边激进,而没有 commonground。事实上,美国的保守跟激进中间,还有一个 commonground。在许多问题上可以说是一致的,譬如说,美国人关于堕胎的问题,宗教上非常保守的 fundamentalist 对生命的看法甚至跟很激烈的妇女运动的人是一致的。可是这个一致并不是说他们有共同思想,只是说激进的人可以利用保守主义的某些观点来达到他的目的;保守主义也同

样可以利用激进的观点。在某些地方,极端保守的跟极端激进的甚至可以联盟。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中间是一个实际的现状,是一个自由的传统。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只有对这种生活方式感到满意,或感到不满意而已。

在中国过去,我们刚提及王安石变法,其实王安石变法跟司马光反对变法也相对于一个秩序,就是中国传统的、以儒家为主宰的政治伦理的秩序。王安石要相当大幅度地改变这个秩序,而司马光则较持重,认为不应该有太大的变动。但这并不表示司马光是完全顽固、保守的,只是他觉得有些不应该变得太快。他又举出许多的例子,说明中国地方很大,某一项特殊的新法对南方有利,对北方则可能有害。然而,他们两人都肯定一个共同的体制、秩序。王安石也没有意图要触动整个秩序。譬如说,王安石变法根本没有侵犯到皇帝的权力,也不是要推翻整个政治制度,只不过要作大量的改变,使它合乎一个新的情况而已。因为宋代承继了唐末五代的混杂的政治制度,运用不灵,要推行新政策便不能不在制度上作重要的改变。此外,宋代的社会跟唐代的贵族社会也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变法的社会背景。但是,王安石跟司马光基本上是承认儒家规定的伦理政治秩序是可以肯定的。只是一个人主张动得少一点,另一个则要相当彻底的改变。这相对于现在美国的 radical 跟 conservative 也差不多。

在中国近代史上,从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到 19 世纪末叶,中国的现状正在不断地变,没有一个秩序是稳定的,没有一个基础可以作为衡量保守或激进的根据。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在这里涉及太多的史实。我只想说明,在中国近代、现代思想史上,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特色。我现在想把这个变化简单地分成几个阶段来看。

第一个阶段是在“五四”运动以前,大致上是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那时魏源等人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就是学习西方人技术上的长处,用船坚炮利来对付外国人,这是技术上的改

变。早在 19 世纪中叶,这种思想就出现了。例如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有一篇就叫《采西学议》,可见“西学”的观念已经出现了。张之洞后来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事实上张氏的原文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只是后来一般的用法把它改了,这个改变跟他的原意有些不合,下面我将予以解释)便是进一步的发展。总之,最初中国对“变”的要求是在科技上学习西方人。后来则发现西方的政制也大有可观,如郭嵩焘因曾出使英国,对西方比较了解,回国以后,便宣传西方的风俗制度,以致为守旧派加以“汉奸”之恶名。可是最初这个阶段,好像大家对中国原来一套政治伦理秩序还没有发生大动摇。尽管李鸿章称这是“三千年来未有的变局”,但这个“变局”中国似乎仍可以应付。

接下来就到政治改革,也可以上溯到魏源,在他的公关学中已经隐含了改制的倾向。不过这要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才正式提出。变法运动是近代思想上激进与保守对垒的开始。康氏认为枝枝节节的改变是没有用的,于是提出了“全变”、“速变”的主张。康氏首先开始对传统的政治制度提出基本的怀疑。他认为:这个制度已没有办法应付“列强瓜分便在眼前”的危急情势,因此必须采用君主立宪的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新事物。在变法中,形式上是保留皇帝,但实际上已经走上西方的政体了。所以这种思想比王安石的变法激进得不可以道理计,所以引起的反响也极其巨大。

张之洞在说“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时候,他的“新学”已包括了一部分西方的政制——即所谓“西政”——在内。可见对政治制度的改变是晚清一个很强烈的要求。不过张之洞的“旧学为体”依然维持中国传统的名教纲常;这是清朝统治者和一般守旧的人都可以接受的。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用今天的话说,则已接近“体制外的改革”了。这自然激起了一批反变法的人物。譬如苏舆编的《禹教从编》便收集了许多反对的言论,在湖南一省引起很大波动。自从康梁要求“全变”、“速变”以来,这个“变”便没有一个底,

不知道要变到哪里为止。因为中国人一直找不到一个可以认同的社会体制,也没有任何共识可以被大家都接受。近代中国第一次开始要求变法就发生这样的问题。

换句话说,既然传统的政治伦理秩序不能成为我们的根据,那么我们就需要整个彻底的改换。这样一来,改换当然不限于政治,所以在康有为提倡变法的同时,也涉及宗教的改变,譬如他要立孔教。他创孔教当然是仿照西方,要把中国的儒家变成有组织、有形式的宗教,有如基督教。因为他认为西方强大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宗教的力量。我觉得他对西方看得很对,但是要把儒教改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宗教却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在思想上,谭嗣同可以说是当时激进派的最高的代表。他把康有为“变”的思想推到最大的限度。他在《仁学》及其他作品中,甚至他的诗中,都表现了极为激烈的态度。一口就否定了中国两千年的传统。他曾说:“两千年的‘政’都是‘秦政’,‘秦政’就是大强盗;两千年的学是‘荀学’,是乡愿,而且两者狼狈为奸。因此不但整个的专制政体要改变,思想传统也要全变。这真是一个极端激烈的想法。尽管当时变法仍是以政治制度的改变为主体,但康有为、康启超,特别是谭嗣同,已经感受到整个中国的伦理道德秩序也必须改变。譬如谭嗣同说整个五伦都是束缚我们的;五伦之中只有朋友一伦是平等自由的,可以保留。这些思想可说已是差不多激烈到了尽头。但这个时候,在“五四”运动以前,我觉得激进主义基本上还是政治的激进主义,虽然已经接触到文化的层面,但还没有完全直接而全面地碰到文化的问题。

到“五四”运动,又叫新文化运动,是从民国六年(1917年)提倡白话文开始。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个运动将保守跟激进的对峙从政治推进到文化的层面。这是属于第二个阶段。在康有为、谭嗣同看来,中国还是要用某些“中国”的东西,譬如《孔子改制考》要用孔子的名字,《孟子微》要讲孟子。尽管当时有人指出,他讲的是“用夷变夏”;表面上是中国的东西,暗地里则是西方的模式。这

个说法也有一些道理,不过略嫌简单化了。大致上,他是主张在政治上改变中国,为了政治上的改变,而不能不触及宗教、道德、伦理各方面。

到“五四”以后就直接碰到文化的问题了。“五四”前,政治方面的激进化并没有到康有为为止。因为康有为的变法还要保存皇帝。但这在当时仍不能满足中国的激进化思想,特别是革命派。因此孙中山跟同盟会的人要革命。这显示当时的的问题不是有个虚君制度就可以满足的,人们要采取共和的形式。这就是革命派与立宪派之争。中国思想因为变化得快,所以短短几年之内,康有为几乎已被人看成一个保守的象征,是一个保守主义者,革命派才是激进的;因而在政治上发展到以革命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就是辛亥革命的历史。

在这个阶段,甚至辛亥革命的人,包括参加同盟会的人,也并完全对中国文化采取否定的态度,譬如说《国粹学报》。“国粹”两个字,是借用日本的名词,意谓民族的精华,这就是当时革命的人的看法。他们认为“革命”、“共和”、“平等”、“人权”、“自由”、甚至“民约”等都是中国古代已有的东西,是我们的“国粹”,不过被后人遗忘了、丢失了。他们认为政治上要以极端的方式把两千年的君主专制推翻。要建立一个共和的民主国家。这是恢复固有的国粹。孙中山便是这样讲的。中国政治激烈化运动得到一个成果,就是辛亥革命的成功。但是今天我们都知道辛亥革命成功,尽管政府的形式变了,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虽面对一个新的情势,但还是不能满意。民国初年又有袁世凯的复辟运动,而且孔教跟复辟运动又好像有关连。在这种情况下,对传统文化的评价就一步一步的深化。深化的结果就是激烈化,对传统文化开始觉得有问题。到“五四”运动,就变成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要负责任的问题。

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我们发现政治的现实是没有什么值得维护的现状。所以保守主义很难说话。保守主义很难有什么立

足点。你能说要维持袁世凯的独裁甚至帝制吗？你要维持后来的军阀体制吗？在没有现状值得维持的情况下，就只有另外一股力量，就是激进的力量拼命地发展。基本上中国近百年来是以“变”：变革、变动、革命作为基本价值的。并不是像西方般有一个基本系统(system)在那里，有些人要保守它多少，有的人要改变它多少。不是这样一个问题，而是中国在现实上找不到一个体制、系统，可以使大家安定下来。中国有一种特殊的现状，就是保守与激进之间没有一个共同的坐标，因此双方就永远不能有真正的对话。

到“五四”运动，我们看见，碰到的问题已不是移用西学、西政就可能解决的，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现代化来代替中国旧的文化，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意义。今天大陆常常有些人视之为一个启蒙运动，并与18世纪法国的Enlightenment相比。这当然也有一部分道理，例如进步变成最高价值，任何人敢对“进步”稍表迟疑都是反动、退后、落伍、保守。在这种情况下，保守的观念和进步的观念就不能保持平衡。在西方，例如英国有保守党，它并不以“保守”为可耻。但在中国我却未碰到过人会称自己为保守党。中国人如果对旧东西有些留恋，说话时就总带几分抱歉的意思，虽然他心里并不是真的抱歉，因他总觉得保守、落伍是说不出口的。只有前进、创新、革命这才是真正价值的所在。所以中国思想史上的保守跟激进，实在不成比例，更无法互相制衡。这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现状可以给保守者说话的余地。你要保持什么？因为这个“变”还没有定下来，没有东西可以保存。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少人是用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些观念作为推翻和取代传统制度的根据。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民主跟科学了，民主跟科学变成两个最高无上的价值。这就是《新青年》陈独秀所提出来的。陈独秀在提出来的时候，包括李大钊在内，也提出了中西文化的问题。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文化本身是要不得的，中国文化本身不但产生不了民主与科学，而且正是民主与科学的最大的障碍。由此可见“五四”比变法、革命时代的

思想又激进多了。康有为还借用孔子、孟子大同，谭嗣同还讲“仁”，革命派也强调“国粹”。“五四”的领袖则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直截了当地要向西方寻找一切真理。

科学所代表的精神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认为求知是一个很高的价值，是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态度，为求真理而真理的态度。在中国比较重实用的传统中，或以道德为主体的文化中，这是比较受压制的一种态度。这种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是西方特别之处，所以“五四”所介绍的是西方两百年的正统思想，也就是自由的传统(Liberal tradition)，包括科学的传统来代替中国旧的传统。但在这个要求之下，“五四”后就发生了两次很重要的争辩。第一次是“科玄论战”，一方是“保守派”，以张君勱为代表，主张人生问题不是科学所能解决的，是要靠直觉的，所以玄学是有其作用的；另一方以丁文江等人为首，所谓“科学主义”的人，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以统一人生观。到后来连陈独秀也参加，认为科学的最新形态是“唯物主义”，是“唯物史观”。

在此我们不是谈它的内容，而是看其显示的问题：严格地说，中国没有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只有要求不同程度变革的人而已，要求变革较少的人往往就变成了保守主义者，譬如张君勱，他实际上是主张西方式的宪政民主最有力的一人。他并不反对科学，不过坚持人生问题不是科学所能解决的而已；他的思想是受了德国人文学传统的影响。此外，梁漱溟先生当时也被认为是保守主义者，今天西方研究他的人，也称他为保守主义者。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梁先生认为中国文化非变不可，而民主跟科学，更是中国非要不可的东西。所以从这方面看，他不见得是怎样的保守，不过他觉得改变要适应中国原来的现状、原来文化的状态。他认为西方不是文化的惟一模式，至少从他看来文化有三个形态：印度的、中国的、西方的，我们不管他的“三分法”跟他的论据有没有道理，但从中可见他并不抗拒西方文化；而是有机地、整体地接受西方文化，然后改变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这句话他是说